

论AI赋能农村养老的认知与接受障碍及文化成因

王 景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生态文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1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2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30日

摘 要

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数字技术扩散深度交织，AI养老设备在农村普遍面临发下去但用不起来的困境。本文以文化门槛为核心概念，揭示农村老年人接受AI设备面临信任、身份、情感三重阻力，这些阻力根植于四重文化逻辑，即系统信任难以嵌入熟人社会，监控逻辑冒犯老人的尊严，功能替代满足不了人情需求以及技术预设偏离老人的真实生活。贵州村嫂、南陵生命探测器、云阳AI摄像头等案例表明，以本土中介实现信任桥接、以日常器物实现技术隐形、以分级响应实现情理交融是技术嵌入乡土的有效路径，其前提是技术嵌入而非技术替代、技术适配社会而非社会适配技术。研究提出，跨越文化门槛需从信任桥接、污名消解、功能定位、需求转译四个方向推进，实现从技术中心向文化敏感、从替代逻辑向辅助逻辑的根本转变。

关键词

AI赋能，农村养老，接受障碍，文化门槛，乡土逻辑

On the Cognitive and Acceptance Barriers of AI-Empowered Rural Elderly Care and Their Cultural Causes

Jing W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acul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21, 2026; accepted: July 22, 2026; published: July 30, 2026

Abstract

The aging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is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diffu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文章引用：王景. 论 AI 赋能农村养老的认知与接受障碍及文化成因[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7): 564-571.
DOI: 10.12677/ar.2026.137493

AI-based elderly care devices widely face the dilemma of being distributed but not used in rural areas. Taking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hreshold” as its cor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rural elderly individuals encounter triple resistances in adopting AI devices, namely trust, identity, and emotion. These resistances are rooted in fourfold cultural logic: the difficulty of embedding systemic trust into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the way monitoring logic offends the dignity of the elderly, the failure of functional substitution to meet the demand for human affection, and the deviation of techn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from the real lives of the elderly. Cases including the Cun Sao model in Guizhou, the life detector in Nanling, and the AI cameras in Yunyang demonstrate that using local intermediaries for trust bridging,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to everyday objects to make it invisible, and establishing graded response mechanisms to integrate efficiency with human touch are effective pathways for embedding technology into rural society. These pathways are premised on technological embedding rather than substitution, and on technology adapting to society rather than society adapting to technology.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crossing the cultural threshold requires advancing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in four directions: trust bridging, stigma dissolution,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demand translation, thereby achieving a fundamental shift from a technology-centered to a culturally sensitive approach and from a substitution logic to an auxiliary logic.

Keywords

AI Empowerment, Rural Elderly Care, Acceptance Barriers, Cultural Threshold, Local Logic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3.23 亿人, 占总人口的 23.0%, 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1]。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 且呈现高龄化、空巢化叠加态势[2]。与此同时, 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 使传统“养儿防老”模式难以为继, 农村养老面临家庭功能弱化与公共服务短缺并存的困境[3][4]。随着数字社会的建设, 互联网、云计算、AI 等科技成果不断赋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25 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 明确将养老纳入 AI 赋能生活服务的重点领域。智能手环、一键呼叫、生命体征监测等设备开始进入农村, 于政策层面希望通过技术手段填补照护缺口、降低健康风险、优化资源配置[5]。尽管有政策大力推动, AI 养老服务的实际效能并未得到良好呈现。大量实地调查和案例报告显示, AI 养老设备在农村普遍陷入发下去、用不起来的境地: 设备发放率高, 但实际使用率低; 初期有尝试, 但很快闲置[6]。

现有 AI 赋能养老的研究已从多个层面展开探讨。宏观治理层面, 智慧养老被视为技术、组织与环境多维互动的复杂生态系统, 有学者倡导建立整体治理观, 以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破除社会资源协同壁垒[7]。中观产业层面, 聚焦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模式发展与优化路径, 部分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外智慧养老产业在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人才培育与产业链协作等方面的经验[8][9]。微观主体层面, 智慧养老服务的落地取决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策略互动与协调, 有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指出, 实现智慧养老服务的多方合作共赢依赖于政府的有效干预[10]。

有研究表明, 智慧养老试点政策可借助慢病管理与预防性干预等技术手段, 在降低老年人住院概率

的同时减少其自费支出与总体医疗成本[11]。此外,有学者从经济学视角系统阐述了 AI 赋能农村养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2]。也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指出,智慧养老领域存在认知偏差、使用与效能低下等问题[12]。

现有研究在以下方面还有待加强。其一,研究对象的城乡偏向。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具备高数字素养的城市老年群体,农村老年群体获得的关注度不高[2] [13]。其二,研究视角存在供给方偏向,主要从政策端、产业端、技术端出发,关注如何让 AI 落地,对农村老年人作为技术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与行为逻辑关注不足[12]。其三,现有研究虽提及数字鸿沟、使用率低等现象,但多将其作为技术推广的附带问题加以讨论,缺乏对接受障碍的深层文化成因的系统分析[6] [14]。

为弥补研究缺口,本文转换研究视角,从技术赋能转向技术接受,从供给逻辑转向文化逻辑,聚焦农村老年人对 AI 养老设备的认知与接受障碍问题。核心关切农村老年人的认知与接受障碍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的文化成因是什么?本文提出“文化门槛”这一分析概念,用以概括 AI 养老技术下乡过程中技术逻辑与乡土生活逻辑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逐层揭示认知与接受障碍的三重维度及其文化成因。

2. AI 赋能农村养老的内涵与认知边界

与一般意义上的智慧养老不同, AI 赋能强调的是技术对原有服务系统的能力激活与增强,而非简单的设备替代或功能叠加[15]。从技术层面看, AI 赋能养老主要包括健康监测与预警、智能交互与陪伴、自动化生活照料、医疗资源下沉等应用场景[16]。从制度层面看,涉及政府、市场、社区、家庭等多主体的协同参与,需要在技术供给与养老服务需求之间建立有效的匹配机制[17]。

农村养老的特殊性构成了 AI 赋能的约束边界。农村老年人口收入主要依赖子女转移支付等非制度化来源,稳定性不足;养老需求偏好多为“生存与安全”导向;服务供给主要依赖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密集型方式;技术适配面临数字鸿沟而非体验鸿沟[2]。这些特征决定了 AI 在农村的潜在角色是对稀缺专业人力的补充,而非对现有服务体系的彻底重构。

与供给端快速推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需求端的接受状况并不乐观。实地调研显示,农村老年人对智能设备的使用呈现显著的倒金字塔特征:设备拥有率高于基础操作率,基础操作率高于深度应用率[6]。在安徽黄山的调查中,85%的农村老年人因数字素养不足而被技术边缘化,智能设备的核心功能平均在6个月内失效[6]。江西临川的案例则表明,即便安装了 SOS 呼叫报警器,由于持证护理员严重短缺,“有报警、无响应”的困境依然突出[18]。

3. 农村老年人对 AI 设备的接受障碍

3.1. 信任门槛: 乡土信任的排斥机制

农村老年人的信任结构以血缘和地缘为经纬,以长期面对面的互动为根基。邻里之间的一声招呼、村干部的一句承诺,其可靠性来自日积月累的人际验证。这种信任不需要合同、数据以及第三方背书,直接嵌入日常生活之中[19]。

AI 设备所代表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信任类型。它依赖算法、数据以及远方的服务器和未知的维护人员。当老人按下 SOS 按钮,他看不见谁在接听、不知道对方在哪里、也无法确定对方何时会到,心里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乡土信任逻辑中是不可接受的[20]。大多数的农村老人更倾向于选择熟人照料,而不是专业护理设备。还有老人说,在这里能晒太阳、拉家常,比住养老院自在[21]。这种朴素的表达告诉我们,技术提供的功能再多也替代不了熟人网络带来的确定性和安心感。

技术的不透明性会进一步加剧信任鸿沟。老人不知道数据传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谁会看到他的心跳

和血压，不知道报警之后多久会有人来[12]。而邻居张大爷的嗓门是透明的、可预期的，且经过了几十年验证。当技术系统无法提供同等程度的可预期性时，被边缘化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不是老人保守或固执，而是乡土信任逻辑的自然延续[19]。

3.2. 身份门槛：技术符号的污名化机制

对农村老年人来说，衰老不是一个医学概念，而是社会身份的变化。从能下地干活到需要人帮忙，从当家做主到听子女安排，每一步都是身份降级的过程。老年人对此极为敏感，用各种方式抵抗这种降级，他们坚持自己做饭洗衣、出门办事，都是在宣告自己还能行[15]。

AI 设备的问题在于催化老年人的身份焦虑。他们认为戴上智能手环就等于向所有人宣告我需要被监控，安装跌倒报警器等于承认我随时可能出事，使用护理机器人等于默认我已经不能自理。这些设备在技术逻辑中是安全保障，在乡土社会的符号系统中却是衰老和失能的标记[22]。智能设备发下去但用不起来[6]。这不是技术问题，设备的设计并不复杂，操作也不算困难。但老人不愿学，更准确地说，是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学。学习使用这些设备本身，就是一种对衰老的公开承认[22]。在面子和安全之间，很多老人选择了前者。他们宁可承担一定的风险，也不愿意每天戴着那个提醒自己和他人我已经老了的标记[6]。

3.3. 情感门槛：技术照护的情感限度

技术最擅长的东西是监测、报警、记录以及提醒，这些功能对于解决农村老人独居的安全问题确有帮助。但老人缺的不仅仅是安全[18]。

技术还无法提供情感支持。陪伴机器人可以用算法生成关心的话语，但老人知道那不是真实的[17]。技术的本质是效率逻辑，即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成本完成最确定的任务。而养老的本质是关系逻辑，需要的是倾听、陪伴以及那种不确定但温暖的人际互动。

贵州的实践从反面印证了这一判断。当地引入村嫂作为技术的中介者，她们既会操作设备，又是老人熟悉的人，可以帮老人量血压、用手机，陪老人聊天。技术的功能没有变，但因为有了有温度的中介，老人接受了这些[23]。因此，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能否嵌入情感网络。

3.4. 内部差异：年龄分层与经济分化的调节效应

农村老年人并非一个均质的整体。我国老年群体在年龄、收入、家庭结构等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忽视这种内部异质性容易陷入对农村老人的刻板化想象[2]。我国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乡村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显著高于城镇；在老年人口内部，60~69 周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比 55.83%，80 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比 13.56% [24]。基于此年龄分层导致了接受障碍重心的转移：75 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操作性门槛优先于文化性门槛，记不住操作步骤、看不清屏幕成为首要障碍；而 65 至 75 岁低龄老人的身份门槛更为突出，佩戴智能手环可能被邻里解读为子女不孝或无能的符号。研究表明，年龄是影响数字素养的最显著因素之一，年轻老年人的数字能力显著优于高龄老年人[25]。

经济分化深刻影响着障碍的表现形态。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农村老年人的数字接入与使用，低收入群体在设备拥有和持续使用方面均处于劣势[25]。经济相对宽裕的老人对监控逻辑的排斥更强，而经济困难的老人更倾向于被动接受免费设备，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即沦为摆设，身份门槛在此表现为接受施舍带来的羞耻感与放弃安全保障之间的两难。家庭结构同样调节着障碍的运作机制，独居老人的情感门槛最难逾越，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其抗拒本质上是对自主权的捍卫，而与孙辈同住的留守老人可能通过代际反哺获得部分支持[26]。

4. 接受障碍形成的文化逻辑

4.1. 系统信任与熟人社会的脱嵌

农村社会是一个高度嵌入的系统，社交网络本身就是最有效的信用凭证，不需要外部证明。AI 技术的问题在于其脱嵌特性，智能设备、数据服务器、呼叫中心等技术系统与老人的熟人网络毫无交集。老人面对完全陌生的系统时缺乏判断其可靠性的依据，技术系统要求他放弃对人际关系的依赖而去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追溯的抽象系统，这在传统乡土认知框架中难以完成。AI 设备与老人之间没有任何互动历史，从而导致信任断裂。

4.2. 监控逻辑与尊严逻辑的对立

技术系统预设透明化等于安全，认为掌握老人的位置、身体指标等数据就能及时干预，这一逻辑在工程上成立，在社会生活中却遭遇强烈抵抗。对于正在经历衰老的老年人，身体和生活的不可逆变化已令人焦虑，技术监控不仅未能缓解焦虑，反而将其显化与持续化。在熟人社会中，任何额外的标记都会被放大，技术将个人的衰老变成公共可见的符号，这是许多老人无法接受的代价。

4.3. 人情需求的错位与技术预设的偏离

技术系统的优势在于处理边界清晰、可量化和标准化的任务，但老人的核心诉求不是功能本身，而是功能承载的人际关系意涵。子女问候的价值不在于传递信息，而是确认对老人的情感投入，这依赖长期互动积累的信任与情感纽带。技术系统可模拟问候的言语行为，却无法生成真正的人际关系。

技术预设与主体现实的偏离也会导致老人的反感。开发者常基于对老龄群体的刻板印象设计产品，想象的老年用户与真实生活经验存在系统性偏差[27]。技术系统预设用户有能力且有意愿学习新工具，但农村老年人的数字能力普遍有限，在接入、使用、素养等维度均低于城市同龄群体，这不是个体能力问题，而是技术预设与用户现实的结构性错位[14]。技术可承担标准化、可重复、低风险的任务，却无法替代人际照护中的判断、温度与责任。承认这一边界不是对技术的贬低，而是对技术功能的理性定位。

5. 技术嵌入的可能路径

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之间并非天然对立，乡村社会本身蕴含着调适技术冲击的内生性机制[26]。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农村，数字技术与养老服务的融合已涌现出多种创新模式。

5.1. 本土中介的信任桥接作用

贵州村嫂模式提供了超越系统信任与人际信任二元对立的实践范例。在欠发达地区形成了市场驱动加村嫂联结的模式，村嫂作为联结中介承担信任转译与情感劳动的双重角色；在较发达地区形成了政府保障加村嫂执行的模式，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建立规范化服务体系[28]。两种模式的共同特征在于，村嫂既是技术系统的执行者，又是老人熟人网络中的自己人，其个人信誉为不可见的技术系统提供信任担保，老人的使用动机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寻求。数字技术嵌入农村养老，需要在文化、关系、技术、结构、制度五个维度协同推进[28]。以本土信任节点为中介，系统信任得以通过人际信任的通道嵌入乡土社会，这是跨越信任门槛的核心机制[23]。

5.2. 日常器物的技术隐形策略

通过产品设计去标记化，将技术功能嵌入老人已有的日常生活物品之中，可以有效规避身份门槛。福建顺昌建西镇的幸福智养数字平台搭载了可识别闽北方言的 AI 智能体，方言识别降低了文字阅读门

槛，平台以服务者而非监控者的姿态出现[29]。安徽南陵县为困难老人配备的生命探测器是一种非接触式设备，可安装在床头、马桶旁等高频活动位置，老人无需主动佩戴，遇到紧急情况拉动绳子即可一键报警[30]。当技术不再以新设备的独立形态呈现时，老人不再需要做出被监控的公开声明，身份门槛因此被绕开。温州平阳双峰村的智能手环同样嵌入语音助手降低操作难度[31]。

5.3. 分级响应的情理交融机制

解决技术标准化与养老服务人际关怀之间矛盾的关键，在于建立技术与人工的分级响应机制。重庆云阳农坝镇引入具备跌倒识别功能的 AI 摄像头，可在 1 秒内判定跌倒风险，异常情况触发声光警报并同步推送至指挥中心，应急小组迅速赶赴现场处置[32]。技术解决发现问题的效率，人工承担需要判断与温度的环节。佛冈水头镇使用自动驾驶配送车提供送餐服务，配送时长大幅压缩，取餐环节仍由村干部现场分发，前端的人际交接保留人情温度[33]。人工智能助力养老服务的关键在于辅助而非替代[34]。成功模式的前提是技术嵌入而非替代，是技术适配社会而非社会适配技术。有些鸿沟无法用技术填平，长期陪伴需要人的在场，深度共情需要人的理解，灵活处置需要人的判断。这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对技术边界的正确认知。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之间并非天然对立。乡村社会本身蕴含着调适技术冲击的内生性机制，个体层面的策略性筛选、家庭层面的替代补位与社群层面的社会性整合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功能互补的社会缓冲层[26]。

6. 跨越文化门槛的实践路径

6.1. 以本土中介修复系统信任的嵌入缺陷

信任门槛的核心问题在于 AI 所代表的系统信任无法与乡土社会的人际信任结构对接。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不是让老年人放弃对熟人的信任，而是以人际信任为系统信任提供嵌入通道。贵州天柱县的实践表明，村干部、村医、村嫂等本土信任节点能够有效发挥“信任桥接”功能。他们本身处于老年人的信任网络之中，可降低技术系统的不确定性感知。这一模式的实质是以社会资本弥补系统信任的信用赤字。推广这一经验，需要将本土信任节点正式纳入技术推广的服务链条，赋予其明确的角色定位与激励机制，而非仅仅视为设备发放的行政末端。

6.2. 技术符号的去标记化与意义重构

身份门槛的根源在于智能设备在乡土社会的符号系统中被赋予了衰老与失能的负面标记。因此，消解污名的路径在于技术符号的意义重构。在产品设计层面应淡化设备的监控属性标识，强化其生活助手的定位。在功能设置层面，将健康监测嵌入老年人已有使用习惯的物品，如智能水杯、智能床垫、智能马桶等，而非额外增加一个需要佩戴装置。在话语层面，避免使用“监控”“监测”“看护”等可能触发污名联想的词汇，转而采用“助手”“伙伴”“管家”等中性或正向表述。技术的话语建构不应强化衰老焦虑，而应强调对生活自主性的提升。

6.3. 从替代逻辑转向辅助逻辑

情感门槛揭示了一个根本性边界，即技术可以替代功能，但无法替代关系。因此技术的合理定位是辅助而非替代。定时提醒、生理指标采集、简单信息查询等标准化、重复性、低风险的任务可以由 AI 技术完成。而需要情境判断、共情回应、灵活处置的任务仍应以人为主体。在制度设计方面，建立技术与人工的分级响应机制。以紧急呼叫系统为例，由技术负责信号的传输与初步分级，由人工完成后续的响应与处置。技术不能解决“谁来响应”的问题，但可以帮助明确响应的责任主体与优先级。

6.4. 弥合设计者想象与用户真实间的距离

技术预设与主体现实的偏离源于设计者与用户之间的社会距离。设计者的生活方式、技术能力与农村老年人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在设计理念层面,应放弃“用户会主动学习”的技术中心预设,转向“技术应适应用户”的以人为本的原则。界面设计应采用大字体、高对比色,简化功能层级,将功能设置聚焦农村老年人的高频使用场景,避免附加复杂功能。语音交互应支持方言识别,降低文字阅读门槛,合理回应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在产品迭代层面,可适当延长软硬件的生命周期,降低老年人的学习成本。频繁的界面更新对青年用户是体验优化,对老年用户可能是持续的认知挫败。通过借鉴长期支持版本模式,为老年用户提供稳定的操作环境。同时,建立线下技术支持网络,由村干部、志愿者或村嫂提供持续的技术帮助,不只依赖线上客服或纸质说明,回应老年人“遇事找熟人”的行为惯习。

7. 总结

本文以文化门槛为核心分析概念,考察了农村老年人对 AI 设备的认知与接受障碍及其文化成因。研究发现,接受障碍表现为信任门槛、身份门槛与情感门槛的三重叠加。三者之间存在递进关系,信任门槛决定技术能否进入老年人的生活世界,身份门槛决定技术能否被持续使用,情感门槛则揭示了技术无法替代人际关系的根本边界。这三重门槛共同构成了 AI 技术下乡的结构性阻力,而这些阻力又根植于更深层的文化逻辑,即系统信任与熟人社会的脱嵌、技术符号的污名化机制、功能替代与人情需求的错位、技术预设与主体现实的偏离。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并论证了文化门槛这一分析概念,将技术接受研究从能力与成本的范式转向意义与信任的范式,揭示了技术赋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文化适配。要跨越这一门槛,需要从信任桥接、污名消解、功能定位与需求转译四个方向推进实践转型,其核心是从技术中心转向文化敏感、从功能优先转向关系优先、从替代逻辑转向辅助逻辑。唯有在技术逻辑与乡土逻辑之间找到平衡点, AI 赋能农村养老才能从政策愿景转化为老年人的真实获得。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媒介可供性视角下返乡青年“城乡两栖”适应路径研究(2024SJZD143)。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人口总量有所减少,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3.0% [R/OL]. 中国老龄协会. 2026-01-19. <https://www.cncaprc.gov.cn/xllsy/770049.jhtml>, 2026-04-19.
- [2] 刘承芳,陈思玮.人工智能赋能农村养老:理论基础、实践路径与风险挑战[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1): 23-33.
- [3] 高鸣.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关键影响、应对策略和政策构建[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8-21.
- [4] 齐鹏.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困境与转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3): 105-116.
- [5] 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EB/OL]. 2025-08-01.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8/content_7037861.htm, 2026-04-19.
- [6] 赵思燕,陈军硕,叶良均.数智技术赋能农村居家养老的困境与路径——基于黄山乡村的实证研究[J]. 海南开放大学学报, 2025, 26(3): 140-146.
- [7] 顾东晓,张铭钰,杨雪洁,等.整体治理观:“四力耦合”的智慧健康养老理论构建——来自合肥的实践[J]. 公共管理学报, 2025, 22(1): 151-163.
- [8] 崔开昌,刘纯燕.人工智能+养老服务: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2, 42(8): 2037-2044.
- [9] 左美云,郭瑞芳.国外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J]. 新金融 2025(2): 14-20.

- [10] 陈静怡, 黄美娇, 吕庆华. 数字化情境下智慧养老服务生态系统的演化博弈分析[J]. 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 2025, 22(3): 56-64.
- [11] 解坚, 杨玉琪. 智慧健康养老与医疗费用——来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25, 41(1): 108-130.
- [12] 陈友华, 邵文君. 智慧养老: 内涵、困境与建议[J]. 江淮论坛, 2021(2): 139-145.
- [13] 张成岗, 宁学斯. 基层社区智慧养老的生成逻辑及实践路径——基于 TOE 框架的案例探索[J]. 公共管理学报, 2025, 22(3): 89-101.
- [14] 张泽漓. 智慧赋能养老服务的驱动要素、转型逻辑、实践困境与对策[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4(3): 64-74.
- [15] 陈友华. AI 赋能养老服务: 从技术突破到社会协同[J]. 江海学刊, 2025(3): 151-156.
- [16] 冯孜骏. “人工智能技术 + 智慧养老”的路径研究[J]. 智慧中国, 2025(2): 60-61.
- [17] 张钊. 技术-制度互构: AI 赋能养老服务的现实图景、结构性冲突与协同路径[J]. 人口与社会, 2025, 41(6): 104-115.
- [18] 抚州市临川区民政局. 关于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第 022 号提案的答复[R]. 抚州: 抚州市临川区民政局, 2025.
- [19]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 [20] 卢曼. 信任: 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21] 王铭. 让“最后一公里”变成“最暖一公里”——湖南省汨罗市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观察[EB/OL]. 中国社会报, 2026-03-20. https://mzt.hunan.gov.cn/mzt/xxgk/mt/202603/t20260324_33939974.html, 2026-05-07.
- [22] 戈夫曼. 污名: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23] 冯政. 村嫂——家门口的养老顾问[N]. 芜湖日报, 2024-05-14(2).
- [24] 2020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R/OL]. 2021. <https://www.nhc.gov.cn/ljks/c100157/202110/b365898ac2a4406d91e1b1ecd10ca911.shtml>, 2026-05-07.
- [25] 靳永爱, 赵梦晗. 互联网使用与中国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基于 2016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学刊, 2019, 41(6): 44-55.
- [26] 任世辉. 技术冲击与社会缓冲: 农村老年群体数字适应的微观机制及整合性框架——一项界面民族志研究[J/OL]. 电子政务: 1-12. <https://link.cnki.net/urlid/11.5181.TP.20260123.0034.004>, 2026-05-07.
- [27] Merkel, S. and Schorr, S. (2024) Older Adults as Users of Conversational Agents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Designers' and Developers' Motivations and Images of Ageing. *Gerontechnology*, 23, 1. <https://doi.org/10.4017/gt.2024.23.s.918.opp>
- [28] 韦艳, 李婧. 县域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数字化创新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5(6): 90-102.
- [29] 福外“星乡村”产业学院落地顺昌建西[EB/OL]. http://www.fjscnews.com/wap/2026-03/24/content_2323993.htm, 2026-05-27.
- [30] 让困难老人老有所“安”——芜湖市探索散居供养困难老人社会化服务[EB/OL]. 2022-06-14. <https://www.peopleapp.com/rmharticle/30028312163>, 2026-05-07.
- [31] 平阳小山村“触网”记[EB/OL]. 2025-03-03. https://www.zj.gov.cn/art/2025/3/3/art_1554469_60256771.html, 2026-05-07.
- [32] 科技赋能乡村养老 守护农村老人幸福晚年[EB/OL]. 2026-03-16. <http://ex.chinadaily.com.cn/exchange/partners/82/rss/channel/cn/columns/sz8srm/stories/WS69b79b5aa310942cc49a349e.html>, 2026-05-07.
- [33] 佛冈水头: 无人物流车将长者热饭送到家, 科技温度触手可及[EB/OL]. 2025-03-06. http://www.fogang.gov.cn/qyfgst/gkmlpt/content/1/1985/post_1985200.html, 2026-05-07.
- [34] 聂建亮, 薛梦瑶. 人工智能助力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逻辑转换、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5(5): 101-113.